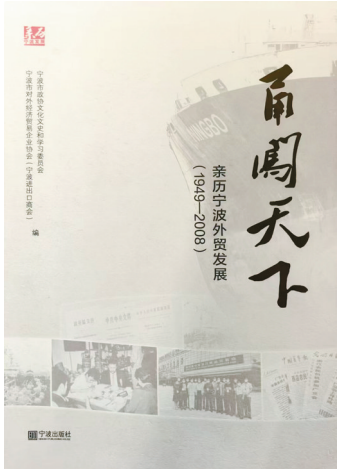


■ 宁波好书

# 宁波的外贸奇迹背后是什么——写在《甬闯天下》出版之际



高庆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间，宁波外贸走过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从拼价格到拼价值，从时欧美到拓全球，从代工贴牌到自主创牌，宁波外贸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管理体系、贸易方式、发展动力、市场拓展、队伍主体等几个维度考量宁波外贸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大致经历了六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宁波地区对外贸易局成立之前。这一时期的宁波外贸主要依托上海等口岸的外贸公司在宁波设立工作组，选择相应的特色商品如金丝草帽、茶叶、丝瓜络等进行采购。

第二个时期是从1972年到1978年底改革开放战略实施前。这一时期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宁波地区各县对外贸易局和宁波市对外贸易局先后设立，宁波对外贸易进入有专职管理机构、有专门队伍的阶段，五金工具、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等产品先后进入国际市场，外贸收购值发展较快（1978年外贸收购值突破1亿元），外贸基础设施有所改善，倪家堰外贸仓库进行建设并陆续投用，包装、轻工等国营专业外贸公司先后成立。

第三个时期是从1979年到1987年底宁波正式实施计划单列之前。这一时期宁波港正式对

外开放，浙江省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纺织品、化工医保、土畜产等6家国营专业外贸公司在甬设立支公司，进行有组织的采购、供货，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加入出口供货大军，“三来一补”让宁波企业开始尝试自营进出口。尤其是1984年宁波被列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后，宁波经济技术贸易公司、宁波纺织品联合进出口公司、宁波开发区进出口公司等一批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本土企业先后设立，推动拥有重点优势商品的企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至1987年，宁波全市出口商品收购总额达10.22亿元。

第四个时期是从1988年到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这是宁波自营进出口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988年，宁波全面实施计划单列，获得自营进出口权，一大批国有专业外贸公司在宁波可以直接从事外贸出口，由此告别了向其他口岸城市和上级公司供货的发展阶段，进入更加充满活力的自营进出口新时期。从1988年到1997年，宁波外贸以年均递增超过60%的速度高歌猛进。但由于遭到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宁波外贸出现了自营进出口以来第一次负增长，以国有专业外贸公司为主体的传统外贸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对此，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抓大、转中、放小、激活、理顺”的方针，深度参与了一系列帮扶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保业务、保队伍，通过改制、转型、升级，宁波外贸得以浴火重生。

第五个时期是从2001年12月到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这是宁波外贸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市场的大门向中国商品开放，宁波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征的大量商品销往全球各地。与上一时期以国有外贸企业为主体的贸易队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外贸经营权放开，宁波外贸队伍迎来了民营外贸企业的大发展。外贸企业从几百家猛增到2万家，外贸规模从不到

100亿美元猛增到近1000亿美元，外贸从业人员激增，形成了“平均每4个宁波人中有1人从事与开放型经济相关工作”的局面。宁波外贸对制造业、物流业、会展业、金融业等的带动作用显著，外贸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一发展局面因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停止，但随后宁波外贸企业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创新研发新产品，发展进口贸易、服务贸易等，使得宁波外贸在整体上保持平稳增长。

第六个时期是2012年11月至今。这一时期宁波举办中东欧博览会等国家级展会，重点拓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外贸规模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跻身全国城市外贸前五；贸易商品结构升级，主力外贸商品由“老三样”升级为“新三样”；加速发展以跨境电商为主要形式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新兴贸易方式；引导外贸企业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宁波由此成为内外贸一体化的领军城市；2020年，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赋权扩区至宁波，使得宁波加入自由贸易试验的行列。目前，宁波片区已有16项创新成果被国家有关部委复制推广，并按照国家部署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70多年来，宁波外贸实现了四大突破，创造了奇迹。第一是外贸队伍数量和结构的突破；第二是外贸商品结构的升级和突破；第三是贸易商品结构的突破升级；第四是外贸规模的突破。目前宁波已实现年度进出口总额破万亿元，位居国内城市第五位。从滨海小城成长为沿海外贸大市，宁波外贸为争创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的市域样板作出了有力贡献。

回望历史，宁波能够脱颖而出，跻身全国外贸五强城市，除了在硬件层面上有宁波舟山港的天然资源加持，在政策层面上有宁波列入沿海开放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特殊机遇，在精神层面上还有以下四个因素：

一是艰苦奋斗、锲而不舍的精神。宁波外贸人白手起家，从零起步，走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正是靠着“四千精神”，短短几年间外向型企业在四明大地处处

开花，共同铸就了宁波外贸万亿元进出口额的庞大规模。

二是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精神。宁波外贸人在每一个外贸形势变化的节点，在每一项外贸政策变动的时刻，都能积极应对、奋勇向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各种重大事件面前，宁波外贸人能抓住变化中的机遇，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发现主动作为的新空间。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宁波拥有自营进出口权以来，宁波外贸系统探索和实施了至少25项“全国第一”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令宁波外贸行稳致远、持续发展。

三是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精神。宁波外贸人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面对全球多元化的市场、变化多端的行情、不断更迭的技术标准，积极尝试学习和适应新的语言、规则、需求、形势，积极团结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研发、制造出适应全天候市场需求的商品，把生意做到了全球221个国家和地区，生动地诠释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

四是诚实守信、达济天下的精神。宁波外贸人深受“宁波帮”诚信为本思想的影响，恪守商业道德，奉行货真价实的理念。所谓“金字招牌硬黄货”，他们把信誉看作商人的生命线，不仅成就了事业，而且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一批批优质的“宁波制造”让宁波品牌走向全球，也让宁波外贸享誉四海。“千军万马闯世界”，正是宁波外贸人相互提携、相互成就的结果。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一部宁波外贸的发展史，正是当代宁波外贸人继承和弘扬老一辈“宁波帮”精神，不断开拓、积极拼搏的伟大征程。

“以史为鉴，共创未来。”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关税壁垒和贸易霸凌对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希望新一代外贸人从外贸前辈的奋斗故事和心声汲取营养和力量，在逆境下闯出新路，努力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推动宁波外贸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 重述与聆听——读谢志强《郭亮的耳朵》



蒋静波

谢志强有一副好听的嗓音，普通话里带着乡音。无论是听他的文学讲座，还是读他的作品，最终，一切仿佛都化作了他的声音，在耳畔反复响起。

《郭亮的耳朵》是谢志强最新出版的微型小说集，收录的作品均属“徐州笔记”系列，所写皆为徐州往事。这些故事的素材由两部分构成：徐州籍同学寄来的地方资料和小时候听徐州籍同学的父母讲述的往事。面对这些素材，谢志强以文学的形式发声，来讲述那片土地上的尘封的故事。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备忘录》中指出，利用库存资源是未来文学的趋势之一，而谢志强正是此道的践行者。几十年来，他潜心收藏古今中外的

童话、民间传说及地方史料，并以此创作了《黑蝴蝶》《过手》《珠子的舞蹈》《江南聊斋》《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等作品。这种方法，他称其为“重述”。

这令我联想到西班牙作家阿莫多瓦的微型小说《信》。母亲为邻居读信、写信，“我”却发现母亲念出的内容与信上写的并不完全一致。她会依据生活的逻辑，虚构一些细节，如“外孙女想念外婆用装满水的盆在家的前门给她洗头”——其实信里根本没有提到外婆。她念完后，大家都很高兴。这位母亲的“发声”，早已超越重述，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层面——这正是谢志强所说的“重述”。

重述，就像把东西吃进去，化为内在的营养，通过有声音的文字表达出来。重述有两种，一种是对史料的重述，还有一种就是对经典的重述。对于前者，有人简单地认为，重述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言把资料再讲一遍，实则不然。文学创作承载文化记忆，根植于历史土壤，重述尤其如此。它如同“戴着镣铐的舞蹈”：史实是土壤，记忆是根系，重述则是生长出的枝叶。它无法脱离根本，却能摇曳、变色，发出沙沙的声音。

重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注入新意，用发现的眼

光跳出固有印象，发掘他人未曾留意之处。在首篇《花卉40盆》中，张勋复辟时以电报“花卉40盆”为暗号，要求心腹张文生调动40个营的兵力赴京支援。而张文生却真的送去花卉40盆，按兵不动。在这一史实基础上，作者虚构了邻居朱翁这个角色。朱翁如同穿过珠子的线；张文生贫困潦倒时，他付船费，助他过湖当兵；张文生从军后，他四处宣扬，引起张勋注意，让张文生渐成其心腹；张文生收到电报时，又是朱翁听他袒露心声……从张文生对朱翁的厚报和信赖中，读者看到了一个知恩图报的人物形象。张文生拒绝出兵，说：“40个营的兵力，也是肉包子打狗，成不了事，当个兵，不容易呀。”作者在重述中，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改变了张文生“观望风向”或“背主求荣”的固有形象，赋予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时完成了小说核心的升华。

重述的力量，在于细节的铺陈与运行。在《娘，我睡哪一头》一文中，作者避开对惨剧的正面描写，只提取母子被推入土坑前的瞬间场景，面对陌生的土坑与凶恶的敌人，刚学会说话的弟弟问：“娘，我睡哪头？”此问以孩童的天真反衬出极致的残酷。同时，“枪”的意象作为另一条暗线贯穿全篇：神枪手父亲弹尽牺牲；弟弟被埋前，敌人夺走了他怀揣的父亲做的小木枪；哥

哥最终继承了弟弟的木枪和父亲的真手枪，并打响了父亲的枪，到母亲和弟弟墓前告慰。在重述过程中，作者强化这些细节，串联起牺牲、传承与告慰，使故事重心转移，立意和境界也随之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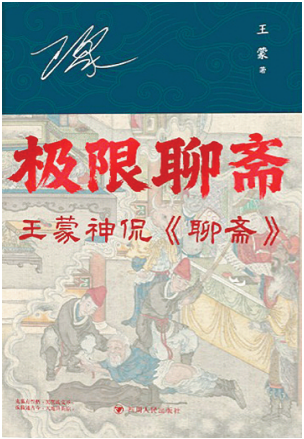
本书分为《郭亮的耳朵》与《过河说话》两辑。如果说第一辑主要依据官方史料创作，其方法是“能走，即写实”；那么第二辑则更多基于个人的记忆，其方法便是“会飞，即幻想”。在第二辑中，作者摆脱了史料的束缚，直接展翅飞翔。

在《听见麦子叫唤的小男孩》一文中，兜兜既能听见麦子的“叫唤”，也懂鸟语。他多次提醒爹娘：“能走，即写实”；那么爹娘则对其所言选择了相信，从而躲过了冰雹灾害，而不信者则损失惨重。万物有灵，孩子的纯真连通着自然与人类，只是成人早已关闭了心灵的通道。这是作者对成人灵魂的深切提醒。

书以《郭亮的耳朵》为名，本身便是一个精妙的文学隐喻。它源自书中的同名作品，主人公郭亮耳力非凡，能在银圆跌落的喧闹中，精准辨识其真伪。谢志强在后记中坦言：“我自以为拥有一双‘郭亮的耳朵’。文学需要这样的耳朵。”

他正是用这双“文学的耳朵”，聆听历史的低语、土地的呼吸与童年的回声，完成了一次次深刻的重述。而作为读者，我们翻开这本书，不也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另一个能够聆听文学之声的“郭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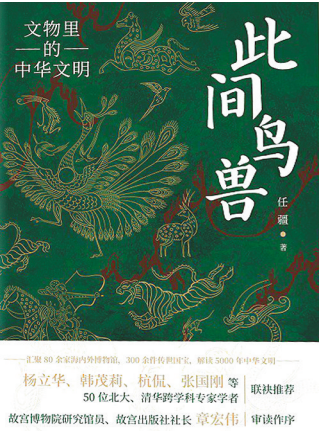
荐书



## 《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

作者 王 蒙  
出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25年10月

91岁的老作家王蒙，还在读书，还在出书。新作《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最近面世，这是王蒙对《聊斋志异》的点评本。“极限”代表了一种距离，无限地靠近，以《聊斋志异》为媒介进行一场思想漫游，从现代视角出发进行多主题阐释。“神侃”代表了写作风格，时而幽默戏谑，时而犀利点评。



## 《此间鸟兽：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作者 任 疆  
出版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4年7月

“在鹿的身上，古人希望四时有鹿（禄），吃穿不愁；在蛙与蛇的身上，古人寄托了子孙绵延的祈盼，创造出女娲、伏羲的神话。”翻开任疆的《此间鸟兽：文物里的中华文明》，开篇便以新石器时代动物图腾的鲜活场景，将读者带入“中国式浪漫”之中。全书16章对应16种动物，

（推荐书友：徐晨）



## 《历史叙事和时间意识：与文学史和文学现场有关》

作者 孟繁华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5年8月

孟繁华的新著《历史叙事和时间意识：与文学史和文学现场有关》以缜密的学理思考和敏锐的文学感知，构建了一座连接文学历史与现场的桥梁。

翻开本书，读者很快会被孟繁华鲜明的意识所吸引。他将历史叙事与时间意识并置，揭示出一个深刻命题：我们如何在时间的流转中安放文学的价值？对此，孟繁华提出“慢的美学”。在被算法与速度主宰的当下，这

“聊斋聊斋，在素朴庄严的斋中闲聊，聊以装扮无聊，内容是众异，鬼狐神仙妖魔，人加非人的集体；而耳中人，不属于人与非人层面，而是人的分解分类。异则不舍，异则志之。”这段话出自《耳中人》章节，“耳中人”的形象颇有寓意，王蒙的评语耐人寻味。这篇小说是别具一格的想象与精神体验，是人对于人生、自我、有无的一种寻觅。

当300年前蒲松龄笔下的狐鬼，在王蒙的解读中说出当代人的心声时，那种时空交错的奇妙感，瞬间拉近了古典文学和现代读者的距离。比如，传统研究认为婴宁是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少女化身，《婴宁》的故事歌颂了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王蒙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婴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而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

本书依王蒙先生的旨趣，以庄子四境为纲，分为“人间世”“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数卷，囊括了50余篇聊斋故事，“非为考据训诂，乃欲借古鉴之目，开掘文本之哲学纵深与当代意蕴”。

（推荐书友：林颐）

每章围绕一种动物展开。从新石器时代鹿、蛙、蛇的图腾信仰，到商代鸱文化的鼎盛；从周代礼乐制度下虎豹喻君子、熊蛇寓福泽的象征体系，到汉代大一统后狮子、犀牛等外来动物的融入；从魏晋南北朝志怪文学中狐妖的兴起，到唐代开放包容下骆驼载乐、舞狮礼乐的盛景；再到宋元“马上封侯”“爵禄封侯”的谐音寓意，明清“太平有象”“兔儿爷”等民俗文化的勃兴——动物意象始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这些定格在文物上的动物图案，不仅是古人情感与诉求的载体，更是我们理解自身文明与文化的钥匙。

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将动物意象的变迁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商代甲骨文中“虎啸生风”的升天仪式，映照周礼巫文化下天命君权的滥觞；周人将鸱鵂为“鳧”而尊乌鸦为“报喜鸟”，则暗含礼乐制度对原始信仰的改造；汉代“辟邪”“天禄”与西域传来的神兽结合，既体现大一统帝国的开放胸襟，又折射出谶纬之学对动物异象的附会；唐代《白蛇传》雏形的出现，更与市民文化兴起、传奇文学繁荣密不可分。这些案例无不说明，动物意象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深嵌入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坐标之中。

（推荐书友：徐晨）

一主张不仅关乎研究方法，更代表着一位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即拒绝被各类研讨会与快速迭代的文学现象所裹挟，坚守文学批评应有的沉潜与深度。

这一主张在他的文本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在讨论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时，孟繁华注意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当众多作家追逐繁复的叙事技巧之际，毕飞宇却选择了一种看似“老派”的讲故事方式，即采用全知视角，宛如一位洞悉一切的叙述者。孟繁华认为，这种不随波逐流的选择，恰恰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创作自主性，显露出可贵的叙事定力。

在评论徐则臣《北上》时，孟繁华的剖析更为细腻深入。他通过“青春作伴好还乡”“北中国的风物志”与“运河上的风情书”三个层层递进的视角，揭示了小说的独特魅力。“青春作伴好还乡”探讨了人物沿运河展开的精神寻根，既为地理行走，亦是文化还乡；“北中国的风物志”细致分析了小说如何将运河两岸的生活细节与民俗风情。编织为生动的北方文化图景；而“运河上的风情书”则阐释了那些日常描写如何共同构筑起一部流动而充满烟火气的人文史诗。这三者环环相扣，共同诠释了《北上》何以赢得专业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双重认可。

孟繁华的批评风格气势磅礴而不失细腻，理论思考与文本细读相得益彰。

（推荐书友：朱延嵩）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